



学生应知自然知识

中国地理学

——  
——

周丽琼  
编

# 目 录

概述清代地理学的发展 .....	1
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	1
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	11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	16
地理总志编纂的成就 .....	22
《明书》、《明史稿》和《明史》中的地理总志 .....	23
《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	38
《读史方輿纪要》 .....	54
《嘉庆重修一统志》 .....	62
《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	74
方志与域外地理志 .....	86
方志 .....	86
域外地理志 .....	108

## 概述清代地理学的发展

17世纪中叶，清兵入关，中国建立了新的封建帝国——清王朝。它先后经历了10朝267年（1644～1911）。在清政府统治这一时期，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社会、政治的变动相关，在清代，文化界、地理学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的局面。

### 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研究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地志著作的编纂，还是沿革考证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清一代，先后由个人或官方组织，完成了多部全国性地理志著作。主要有《明史·地理志》；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肇域志》；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120卷）；陈芳绩（？～1670左右）《历代地理沿革表》（47卷）；徐乾学（1631～1694）《舆地备考》、《舆地志余》、《舆地记要》；杨丕复（1780？～？）《历代舆地沿革表》（40卷）；段长基（1780？～？）《历代疆域表》（3卷）、《历代沿革表》（3卷）；李兆洛（1769～1841）《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清地理韵编》（2卷），以及官修《大清一统志》

等。其中尤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读史方輿纪要》、《历代地理沿革表》、《大清一统志》等最为重要。

在地方志方面，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清中叶，政府仍重视地方志的纂修，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就曾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次年（公元 1729 年）还颁布了规定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之例。当时除了官方组织系统修志外，也有许多学者积极参予私家修志工作。因此，不仅出现了数千种志书，而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方志著作。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 11000 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 8000 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 5298 种。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

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志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11000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8000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5298种。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

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边疆域外地理研究的情况大有改变,一方面研究人员增多,二是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方向,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据对清代有关地理著作文献的分析统计,仅研究西北地区边疆史地的著作,约有200多人、300多种,其中80%的研究著作是在清道光以后至清末这段时间出现的。出现了黄沛翘、曹廷杰、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著名边疆域外地理研究者。著作有沈垚(1798~1840)的《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龚自珍(1792~1841)的《乌梁海表》、《蒙古图志表》、《西域置行省议》、朱一新(1846~1899)的《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1850~1926)的《东三省舆地图说》、黄沛翘的《西藏图考》、屠寄(1856~?)

的《黑龙江舆地图及图说》，以及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795~1872）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刊印）、萧应椿的《五洲述略》（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刊印）、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刊印）等。

这一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士大夫倍感痛心疾首，所以，许多人是抱着“以求抚驭之宜”“徐筹制夷之策”的目的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他们或旁搜博采，援古证今；或亲历边疆实际考察。因此，这一阶段除了一般的考证、见闻记述研究外，研究工作往往是与时政紧密相关。如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中就说道：“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其言重在通商，而唐古特部众又复迭次阻挠，难保不发生变故，且边界汉番杂处，万一乘机窃发，处处堪虞，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曹廷杰在他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中，更是重点介绍山川险要以利防守，并在书中指出何秋涛之所以著《朔方备乘》，是与“俄人乘隙窥我东北”有直接关系。何秋涛自己也在该书的叙言中说，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备国家缓急之用”的。

此外，在清代的传统地理学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汇集历代地理著述的类编型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方舆类汇编、《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以及清末王锡祺（1855~1913）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中国历代重视河渠水利事业，因此，有不少专述河渠水利，以及河流状况的著作存世。清代较之过去各代更有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当时全国河流水系状况

和历代水利资料汇集的著作。主要有：黄宗羲（1610～1695）《今水经》（1卷）；姜宸英（1628～1690）《江防总论》（1卷）、《海防总论》（1卷）；傅泽洪（1640？～？）等撰的《行水金鉴》（175卷）；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156卷）；齐召南（1703～1768）《水道提纲》（28卷）；王太岳（1722～1785）《泾渠志》；赵一清（1722？～？）《直隶河渠志》（132卷）；戴震《直畿河渠书》（110卷）；程瑶田（1725～1814）《水地小记》（1卷）；李元（？～1816）《蜀水经》（16卷）；陈揆（1780～1825）《六朝水道疏》；徐松《西域水道记》（5卷）；陈沣（1810～1882）《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卷）等。其中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尤为重要。

成书时间很早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在长时间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流传，因此，到清代时，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它们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中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后人对古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不同，文字的解释上也各有差异；思想上的理解更是各有见解。这些都为后代阅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由乾隆时期兴起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者，主要是对《禹贡》、《水经注》，以及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程瑶田、丁晏等。清初胡渭（1633～1714）曾著有《禹贡锥指》20卷，地图47幅。搜集历代方志舆地著作史料，

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为大禹治水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考证。此后,徐文靖(1667~1757)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卷,总汇各种解释校注成果。程瑶田则著《禹贡三江考》,专门考释长江。丁晏(1794~1875)所著《禹贡锥指正误》,主要是对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进行辨析、补正。

关于《山海经》的校勘,主要有毕沅(1730~1797)的《山海经新校正》(18卷),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经笺疏》(18卷)。毕沅主要对《山海经》的篇目、文字、山川等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在山川方面,加强了地理内容的考释。郝懿行较毕沅晚,他的著作除了文字等校释外,对山川方位等论证,多与毕沅相同。

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当时用功的人很多。主要有:钱坫(1744~1806)撰、徐松集释的《新斟注汉书地理志集释》(6卷);汪远孙(1794~1836)的《汉书地理志补校》(2卷);全祖望(1705~1755)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校正》(5卷);洪颐煊(1765~1833)的《汉志水道疏证》(4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103卷)等。他们订补了《地理志》中的不少错讹之处。

关于《水经注》的校勘注释,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自问世以来,即被后人广为刊印、传抄、引用。到宋代,版本间已有了较大差异,所以金代开始,即有人进行《水经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订,但直到明代朱谋诜的《水经注笺》,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对《水经注》的校

勘研究，一下成了一门用功最多的学问，几乎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十有八九都校注过《水经注》。其中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黄仪、刘献廷；清中叶有齐召南、全祖望、戴震、赵一清、孙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陈沆、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丁谦等。其中校注《水经注》最有名的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而尤以清中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文字、版本整理为重要。全祖望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戴震有《水经注》。他们通过文字、版本的比较校勘，校理清楚了《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的《经文》、《注文》相互混杂、篇目混乱的现象，基本理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水经注》版本，为以后的《水经注》研究、使用，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者除了对几种主要地理著作的校勘外，还对其它相关地理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整理，特别是进行了许多地理考证工作，如：张庚（1681~1756）的《通鉴纲目释地纠谬》（6卷）、《通鉴纲目释地补注》（6卷）；江永（1681~1722）的《春秋地理考实》（4卷）；檀萃（1740?~?）的《穆天子传注》（6卷）；王绍兰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马宗樑（?~1802）的《战国策地理考》；陈懋令（1759~?）的《六朝地理考》；陈揆的《六朝水道疏》；沈钦韩（1775~1831）的《释地理》（8卷）；管同（1780~1831）的《战国地理考》；郑璜（?~1825?）的《春秋地理今释》（20卷）；徐松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考》（2卷）；程恩泽（1785~1837）的《国释地名考》（20卷）；王鏊（1786~1843）的《四书地理考》（14卷）；丁晏的《禹贡集释》（3卷）；洪孙（1804~1859）的《补梁疆域志》（4卷）；姚燮（1805~1864）

的《胡氏禹贡锥指勘补》(12卷);陈沆的《水经注提纲》(40卷);杜文灿(?~1887)的《禹贡川泽考》(4卷)、《毛诗释地》(6卷)、《春秋列国疆域考》(1卷)、《群经舆地表》(1卷);何秋涛的《蒙古游牧记补注》(4卷);李文田(1834~1895)的《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录注》;赵元益(1840~1902)的《战国策略地》(2卷);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遗文》(3卷)等。特别是清末杨守敬、丁谦、王锡祺的工作最为重要。

杨守敬除有关历史地图工作外,在文字考证方面,以《水经注疏》40卷和《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最为重要。《水经注疏》博采《经》、《传》、《雅》、《记》,相互参证,校正疏理郦注疑滞,利用地志、图经反复校勘,更正郦注本身错误,同时对郦注所征引史实,皆注明出处。其用功之深,考证之详慎,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如潘存题词说:“楚北杨君惺吾(守敬)所撰《水经注释》,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大雅宏达,还我河汉”。《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是杨守敬历时30年,“五易其稿”,悉心研究的成果,该书旁征博引,广为诠释,不仅在《隋书·地理考》地名下注以今地,补叙其沿革及治所迁移,而且书其命名由来和重大历史事件,大大丰富扩充了《隋书·地理志》的内容。同时订正了书中记述,以及相关资料的许多错讹之处。杨守敬的工作弥补了《隋书·地理志》的不足,成为有关《隋书·地理志》研究的划时代之作,至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地理志》,“采用《杨考》者亦较多。”

丁谦(1843~1919)是清末以考证著称的地理学家,

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和古代史籍中的外国传考证两方面。其著述后由浙江省图书馆于民国四年（公元 1915 年）印行，分为两集，称为《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或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其第一集收入著作 17 种 35 卷，包括：《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汉书西南夷朝鲜传地理考证》等。第二集收入的著作为：《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 卷；《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12 种 33 卷。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之奇作”，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型标志。

作为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除了各种地图大量出现外，最突出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经纬绘图法在传统地图中的出现。

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在中国出现很早。晋裴秀（224~271）就曾绘制过历史地理图集性质的《禹贡地域图》18 篇。清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不仅在种类上众多，而且在质量、范围、系统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早在清初，胡渭《禹贡锥指》中就附有 18 幅历史地图。清道光时，李兆洛主持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以《皇朝（清）舆地图》为底本，将上自禹贡、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元明各代地名注于其上，制成 22 幅地图，以红色印制底图（清代）、墨色标记古代地名的传统“朱墨套印”法制版。同时，又将《皇舆表》、《一统志表》中的各地历史沿革注在图上，以便相互对照，成为清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图集。此后，杨守敬所绘制

的《历代舆地图》（又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更是将清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西方经纬度制图法在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出现，除了作为独立的西方制图法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存在于清代的大量地图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后期的许多中国人绘制的传统地图中，出现了不少运用西方制图法的痕迹。如同治二年（公元 1863 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邹世诒、晏圭斋等编绘），就是将西方的经纬度和传统的计里画方法混合使用。清末，为编制《大清会典舆图》，在其所规定的制图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以传统画法为基础和对西方制图法的采用。如：既规定使用计里画方法，又要求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而在已编成的许多省级地图集中，都体现了这种中西制图法混用现象。如《甘肃全省舆图》、《安徽舆地图》、《陕西省舆地图》等，不仅有经纬度，还有图例方面的科学化革新，尽管这些图上的经纬度、投影法等，都极为简单、不准确，但却是中国传统地图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法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 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为了向外发展势力，先后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布道。明万历时即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aeus Ricci 或

Matteo Ricci, 1583~1610 年在华), 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 (Julio Aleni, 1610~1649 年在华)、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 (Johann Adan Schall Von Bell, 1622~1666 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 (Sabbathinode Ursis, 1606~1620 年在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 (Didacode Pantoja, 1599~1618 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 (Niccolo Longobardi, 1597~1654 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59~1688 年在华) 等, 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 宣传了大量西方新知识, 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作为载体。

据统计, 仅利玛窦在华制作的各种世界地图就有 10 多幅, 其图名、绘图时间、刊刻等情况见表 1。地理著作方面有: 龙华民的《地震解》; 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 艾儒略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 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坤舆外纪》等。

通过这些地图、著作的编制、流传, 主要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地球的球形体、世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经纬度制图、投影法等西方地理、地图知识。自明末清初, 这些地图、著作被反复刻印、抄录, 并以它丰富的地理内容和科学方法, 给当时中国的传统地理学以及地理认识以很大冲击, 甚至出现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特别在绘制地图方法等方面, 西方经纬度测量、投影法等, 更是给中国传统“计里画方”制图学以根本否定, 致使清初聘用西方传教士, 采用西法, 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大测量和全国新地图的编制活动。

清初康熙帝对地图测绘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 他给《大清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曾

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此后，他通过对用西方经纬度法测制的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 1707 年）的亲自校勘，看到新法测绘的地图确比旧图要精确。因此，在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后，遂下令采用西法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

表 1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

图名	绘图时间	刊刻者	绘图地点	备注
山海輿地全图	1584	王洋刻版	肇庆	
（世界图志？）	1559		南昌	绘赠王多■
山海輿地图	1595 ~ 1598	赵可怀刻石	苏州	翻王洋本
世界图记？	1596		南昌	王佐编制
世界地图？	1598		南昌	绘得一、二本
山海輿地全图	1600	吴中明刻版	南京	增订王洋本
輿地全图	1601	冯应京刻版	北京？	二小圈图等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李之藻刻版	北京	增订吴中明本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刻工某刻版	北京	复刻李之藻本
山海輿地全图	1604	郭子章刻版	贵州	缩刻吴中明本
世界地图？	1606	李应试刻版	北京	增订李之藻本
（坤輿万国全图）	1608		北京	诸太监摹绘李之藻本多份

自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年），康熙帝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 ~ 1730）、雷孝思（Jean - BaptisteRegis1663 ~ 1738）、杜德美（PetrusJeartoux1668 ~ 1720）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先后测绘了全国 641 个点（未含西藏）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輿全览图》。到清乾隆时，清廷平定了新疆等地后，曾两次（乾隆二十

一年、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新疆测绘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 90 个经纬点,又调整了内地省份的个别经纬点。然后以《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 1762 年)补绘成一幅《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图幅涉及范围比《皇舆全览图》扩大 1 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也成为 20 世纪初以前中国各种先进地图的蓝本。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扩张,许多西方地理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一些地理考察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也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探险的组成部分,这也扩大了国外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了了解世界,也积极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备》统计,自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到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近 60 年间,共有 468 种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属于地质地理学的就有 58 部,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俄罗斯总记》、英国衣丁保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艾约瑟的《冰洋事迹述略》、英国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吴宗廉等译的《澳大利亚新志》、日本野口保兴的《中华大地志》、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辻武雄《五大洲志》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地理、地质学家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地质和资源考察,足迹几遍中国内地,尤其是边疆各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 Pumpelly),他 1862 年来华,曾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上游一带地区。1904 年他再次来华,与美地理学家戴维

斯 (W.H.Davis) 和亨丁顿 (E.Huntington) 考察了天山和塔里木盆地。1903 年, 美国地理学家威里士 (B.Willis) 曾率队来华, 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 归国后著有《中国的研究》一书。俄国地理学家普日瓦夫斯基 (H.M.

) 在 1870~1884 年期间, 先后 4 次来华考察, 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藏北等广大西部地区, 著有《蒙古和唐古特地区: 在东部亚洲高原的三年旅行》、《从伊宁经天山到罗布泊》等著作。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 ( . . . ) 1892~1926 年期间, 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 到过青海湖及河源地区, 著有《蒙古与喀木: 1899~1901 年科兹洛夫的探险报告》等著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Von.Richthofen) 曾在 1860、1868 年来华, 考察了中国东部各省, 以及西北内陆地区, 著有《中国》一书, 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成果。此外, 法国人戴普拉 (J.A.Deprat) 等对中国西南地区、英国人麦克唐纳 (D.MacDonald) 等对西藏地区、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瑞典人斯文·赫定 (SvenHedin) 对中国西部地区, 都进行过重要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他们的考察, 都采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 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记述, 并著有多种研究报告。他们的科学成果, 一方面向国外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 同时, 往往又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研究的基础, 扩大和促进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如他们关于北方地文期, 关于黄土成因和气候变迁, 以及罗布泊地理等问题的探讨, 都成为后来中国地理研究的热点, 促进中国学者对科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视, 加速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